

6/81
鄧建
哥

政治經濟學

思克馬·爾卡
若沫郭



Chohy



276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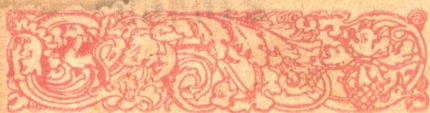
政治經濟學批判

沫若文集中之四

解

571/608/07





沫若譯文集之四
政治經濟學批判

★

刊行者

羣益出版社

總發行

羣益·海燕·雲海

上海聯合發行所

地址

上海山陰路恆豐里77號
電話(二〇)一六七八五

出版期

三十三年六月

版權有

(1-1500)羣(1041)
文集(1016)



序

二十年前大革命遭了挫折的時候，我亡命到日本。那時候因為大病初癒，我住在東京附近的一個鄉下小鎮，兼帶養病。本來是起了一個雄心，想譯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因為出版上有問題，終竟沒有動手。但我卻把這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面讀，一面翻譯了。初版是由神州國光社出版，不知怎的，卻把我的一篇序文失掉了。出版後似乎也遭過一些挫折，我在亡命十年後回國，看見坊間有好些印本是標名『李季譯』，這當然是李季先生所不知道，而且會認為不甚名譽的事，因為我的譯文太生澀，那對於李先生豈不是一個玷辱嗎？

1

這事，我對於書店也不想責難，說不定連神州國光社的負責人也是不知道的這樣的事情在一九三〇年前後的出版界很多，好些翻版書都愛張冠李戴地把譯者或著者

的姓名換掉。我記得周子同先生有一部著作便被換名為「郭沫若著」又有一位先生翻譯的夏目漱石的「枕草紙」也被換名為「郭沫若譯」了。這僅是我所知道的一二例，我所不知道的，或甚至把書名都換掉了的，正不知道有多少了。

換名的動機當然是出於生意經，有的是想換一個名氣較大一點的人以資號召，有的則是企圖避免危險。「郭沫若」這三個字有一個時期實在等於SOS，聽說十幾年來前有些無辜的青年竟因為藏了我的小說而遭了難的。我自己有時候也會決心不用這三個字，有的書店或社團竟也改用了我的別號「郭鼎堂」，或甚至把我久已廢棄了的榜名「郭開貞」拿出來使用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很能了解，這部書的譯者之所以由「郭沫若」改換而為「李季」的翻版家的苦心。

抗戰完結以後又回到上海，承神州國光社以本書的紙版交付，作為版稅的兩抵，我樂於接受了。但我爲了負責起見，當然要把我的名字改回來。假如坊間還有標名「李季」而與本書內容完全一致的譯本流傳，我可以代替李季先生聲明：李先生是不能够

負責的。

這書的譯文實在是生澀得很，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我對於經濟學不十分內行，而本書所論的範圍又是馬克思經濟學裏面的最難懂的部分。關於商品分拆和貨幣理論，多涉於抽象的思維，這對於初學者和我這樣不十分內行的人，的確是一個難關。但這些也正是馬克思經濟學裏面極重要的部分。不僅是經濟學，連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差不多都被包含在這部書裏面了。

這部書本來是沒有完成的，『資本論』也並不是它的改版或續篇。關於商品分析的部分雖被扼要地敘述在『資本論』裏面去了，但關於貨幣理論卻唯一地在本書裏面保留了下來。列寧說過：『資本論的關於商品分拆的部分是必須精讀的，把這部分讀熟之後，其它也就容易了解了。』（大意如此。）這部分的主要內容正是關於商品分拆的這一部分。我們也就可以說：這一部書是『必須精讀』的了。貨幣和價值是有密切關係的，在目前我們中國正當貨幣價值大動盪的時候，這部書的關於貨幣理論的一部分，

當然更可以供給我們以了解現實的鑰匙。

譯文的生澀，我應當負責，但請多多咀嚼它一下吧。好在『資本論』的譯本已經行世，讀者不妨把這兩部書對照着讀，或許可以增加了解上的幫助。本書的原序和『導論』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裏面是很重要的材料。所謂『唯物史觀的公式』是包含在原序裏面的。『導言』雖然不是全文，卻異常地賴人尋味。這應該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一併精讀。後書我也有翻譯，可惜我所譯的不是全文本，而是初被發現時的殘稿本，但在相互了解上，實在是不可少的參考書籍。

在這三項文獻裏面都提到社會史的發展階段。『意識形態』最早，那裏說到財產的形態是分爲『宗長式』、『奴隸式』、『身分式』和近代市民式。『導論』次之，倒敘爲近代式，封建式，奴隸式，『東洋式』。原序又次之，則說爲生產方式有『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市民式的，疊進的四個階段。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式』雖然引起過很大的論爭，但我們根據馬克思來解馬克思，那毫無問題是：

亞細亞的社會主義

再申述一句：『亞細亞的』在這兒也不外就是現今的定語『原始公社式的』。這個『亞細亞』不是單純的地理名詞，因為原始公社在亞細亞的諸民族中保存得較為鮮明，故在修辭上稱之為『亞細亞的』或『東洋式的』。這也就如奴隸社會在希臘羅馬的古典時代保存得較為鮮明，故稱之為『古典的』而已。古典社會不限於希臘羅馬，『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也不限於亞細亞諸民族。這問題在我看來本來是很簡單的，然而不幸得很，卻似乎一直糾繞着，到現在都還沒有十分清晰。剛好在這部書的兩篇文章和『意識形態』裏面有可以了解這個問題的資料，故我不嫌蛇足，又把這個問題在這兒重提一次。

我是這樣相信着：社會進展的階段，依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而疊進，是不能有例外的。這猶如由卵變成蠶，由蠶變成蛹，由蛹變成蛾一樣，在各個階段上的個體儘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個性或特徵，但不能夠跳過一個階段，也

不能夠多出一個階段或把這階段倒逆。假使有這樣的蠶種多一變態或少一變態，或者不是由蠶變蛹，而是由蛹變蠶，那嗎整個昆蟲變態的學說都會發生動搖。但我自己經過了二十幾年的研究，中國社會的史的進展也並不例外。所謂『國情不同』在這一方面也並不能成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於上海。

郭沫若

序 言

序

言

1

我用這樣的順序來考察有產者的經濟之組織：資·本·地·權·雇·傭·勞·動·國·家·國·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研究近代有產者的社會所分裂成的三大階級之經濟的生活諸條件；其它三項之關係一見自明。討論資本問題的第一卷第一部，成於下列各章：1. 商·品；2. 貨·幣·或·單·純·流·通；3. 資·本·一·般。初二章即構成本書之內容。全部材料各以單論之形式已在手中，是一向爲個人的自修所草就的，並非爲付印起見，能否依上列計劃編制成書視將來的情形而定。

我已經草就了的一篇一般的導論，我拋棄了，因爲過細想時，對於將要證明的結果先行表示，覺得不很妥當，並且想全般地追隨於我的讀者，須得放下決心，由個別的昇到一般，不過關於我自己的政治經濟的研究之徑路，在這兒也不妨敘述一二。

我的專攻是法律學，但我只是作爲哲學和歷史之副次的科目而研究的。在1882年至

33年，我擔任着『萊茵日報』之主筆，才第一次走到難關，不能不容喙到所謂重大的利害問題上來。萊茵省議會關於山林盜伐及地權細分事件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長封夏培氏（Herr von Schaper）關於摩惹爾農民之情狀，和『萊茵日報』所公開的論爭，最後是關於自由貿易及保護關稅的議論，才第一次刺激了我去研究經濟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在那時候『想更朝前走』的善的意志遠超在事實知見之上，『萊茵日報』中有一種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薄帶着哲學色彩的反響。這樣的拙劣我自己是表示着反對的，但同時我也明白了，在和『一般奧古斯堡人日報』的論爭中，我從來的研究不能許可我對於這法國的傾向之內容，敢加一句怎樣的批判。所以我也就滿高興接受着『萊茵日報』發行人之幻想，以為把態度放和緩些便可以免掉行將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宣告，我便從公開的舞台上退回書齋。

為解決苦惱着我的疑問我所企圖了的第一項工作，是黑格爾法理哲學之批判的修正，這項工作，出現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誌』之導論中我的研究達到了這樣的成果，便是法律關係與同國家形態由其本身是無從理解，由所謂人類精神之一般的發展

也是無從理解，倒甯是植根在物質的生活諸關係之中這些關係之總和，黑格爾依據十八世紀英法人之先例，統名之爲『有產者的社會』，然而這有產者社會之解剖是應該求之於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之研究，我是在巴黎開始的，後來多蒙幾佐閣下（Her Guisot）之追放命令又移到了不律塞。我所得到的那一般的結果，一次得到之後便成爲了我的研究之導線的，可以簡單地這樣提挈出來：人們在其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中竄入於決定的，必然的，與自己意志無關涉的諸關係裏即是生產諸關係這是和人們物質的生產力之某一個既定的發展階段相應。這些生產諸關係之總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即是一種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之所於以建立。而各種既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的現實的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規約着社會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生活過程之一般。不是人們意識決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會的存在決定自己的意識。到了發展中之某一個階段上，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與向來於其中所活動着的既成的生產諸關係，如單依法律的表現時，則爲財產諸關係，陷入於矛盾。這些關係由生產力之發展形態一變而爲生產力之桎梏。於是遂有一社會革命之時期出現。隨着經濟的基礎之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

築或緩或急地自行崩潰，在此等的崩潰之考察中須得時常辨別着那種物質的自然科學地可以正確認定的在經濟的生產諸條件中之崩潰，與同人們於以意識着這種衝突而欲突破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即觀念的諸形態。個人自以為如是者，不能依據之遽以斷定其為如是，一種這樣的變革時期亦不能由其意識以判斷，反是這種意識是當由物質的生活之矛盾，由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所已成的鬥爭去求解釋。一種的社會結構，在其尚有充分的餘地足讓一切的生產品發展之前，決不會潰滅，而新的更高級的社會關係，在其物質的各種存在條件在舊社會之母胎中尚未完全成熟時，也決不會出現。所以人類所提出的，總只是自己所能解決的問題，因為更詳密的省察時你可以知道，只有在問題之解釋上各種物質的條件已經具備了，或者是在其生存之過程中已經把握着了的時候，問題才自行發生。在大體的輪廓上，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有產者的生產方法是可以表識為經濟的社會結構之進展的各個時代。有產者的生產諸關係是社會的生產過程中最後的對抗形態，所謂對抗非個人的對抗，而是由於個人之社會的生活條件所成長着的對抗，但是在有產者社會之母胎中所發展着的生產力，同

時也在製造着物質的條件以解決這項對抗，於是人類社會之前史便隨着這個社會結構而閉幕。

佛黎德里胥·昂格斯 (Friedrich Engels) 自從他那天才的論文關於經濟的諸範疇之批判 (在『德法年誌』中) 出現以來，我不斷的在和他作文字交，他由別的路徑 (參照他的『英國勞動階級之狀況』) 和我兩人達到同樣的結果，1845年春他也卜居在不律塞，我們便決心把對於德意志哲學之觀念論的我們的反對見解共同的敘述出來，實際也就是清算我們過去的哲學的良心。這個決心是在後期黑格爾派哲學之批判之形態中成就了的。那項原稿，八開紙的兩大厚冊，早就送到了韋斯特法倫的他的出版處，後來我們接到了消息，說是情形變了不能付印。因為我們的主要目的——自我理解——已經達到，所以也就樂意把那項原稿讓結耗子的牙齒去批判了。在當時我們東鱗西爪地在各方面發表過一些意見的零作中，我只舉出昂格斯和我共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所發表的一篇 "Discours sur le libre échange" (自由貿易論)。我們的意見之要點，在1847年我所發表的反對蒲魯東的論著『哲學之貧困』中，才第一次科學地敘述了出來，

雖然尚不免是論辯式的，用德文寫的關於『雇傭勞動』一文本是我在這個題目之下在不律塞德國工會所講述的講演稿，因為二月革命並因革命的結果我又受了比利時的追放，以致未能印就。

1848年及1849年『新萊茵日報』之發行，繼後又有各種事件，我的經濟學的研究中輟了，1850年在倫敦又才繼續起來。在不列顛博物館中所堆積着的那龐大的經濟學史之材料，在有產者社會之觀察上倫敦所站有的方便的地位，最後是有產者社會隨着加里佛尼亞的和奧大利亞的金礦之發現所顯示出的新的發展階段，使我放下決心更始一新地，用新的材料來批判地改作了一遍。這些研究有時自然要引到在外觀上完全是岔路的各種科目裏去，我在這兒也不能不多少費些時間。然而特別是在我是有用的時間却不能不為餬口之苦業而消費。對於英美第一流的報紙，『紐約導報』我的八年間的寄稿，因為我只是以例外的辦法從事於專門的報館通信，不可避免地很分割了我的研究時間。因為關於英國國內和歐洲大陸所發生的顯著的經濟事項，在我的寄稿中佔着極重要的部分，所以實世間上的詳情我也就不能不去親近，那些是屬於經濟學之本來的學術範圍以外的。

關於我在經濟學之範圍內的研究徑路之這個略述只是在表明我的見解是本諸良心的而且是長年月間的研究之結果，儘管別人會怎樣批評，儘管我的見解和支配階級之利害本位是怎樣的不一致。然而在科學之進口處，也就和在地獄之進口處一樣，這個要求是須得揭出的：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à convien che pui sia morta.

在這兒一切的疑慮都須得拋棄

一切的怯懦都須得在「遇見死亡」(註)

1859年一月，於倫敦。

卡爾 馬克思

（註）此二語引自但丁「神曲」之「地獄篇」。

目錄

譯者序言·····	一—六
序言·····	一
資本一般	
第一章 商品·····	一
A. 商品分析之史的考釋·····	四一
第二章 貨幣或單純流通·····	五九
1. 價值的尺度·····	六〇